

第一次到大武汉

祝文广

五十多年了,那列绿皮火车“哐当哐当”的声响,还在我耳朵里。

1970年8月的一个清晨,天没亮透,我就被外公摇醒了。我们要去武汉。一支小小的队伍,在晨雾中出发:先走十八里山路到县城,再挤上颠簸的班车。领头的,是我外公,一个旧时在汉正街做过生意的老人。跟着的,是我的父亲,一个从公职返乡侍奉祖母,如今双手结满老茧的前勤务员。还有我的堂舅,人老实,说话结巴,年近四十,这是头一回出远门。尾巴上坠着的,就是小学四五年级的我,一个通山乡下的毛头小子。

我们要去汉口古田二路,看望大姨妈一家。对困在山里的我来说,“武汉”这两个字,大得像天。中午在咸宁转的车,人挤得像沙丁鱼。黄昏时,车到达武昌。出站后,我们又挤上开往汉口的公共汽车。天色渐晚,车子在武昌城里晃悠悠地开着。我脸贴着窗,先看见蛇山黑黢黢的影子,又看见远处的龟山。接着,车子爬上一个长坡,眼前豁然开阔——武昌桥头堡到了。就在这时,堂舅自己下了车。等我们发觉的时候,车子已经开动,喊不停了。正是华灯初上的时分。我第一次看见了长江。水是浑黄的,沉沉的,望不到头地流着,江心的船小得像火柴盒。两岸的灯火,一点一点亮起来,落在暗沉沉的水面上,碎成一片晃动的金箔。可谁也顾不上看景了。一车人面面相觑,急也没用。只好先把我送到古田二路姨妈家安顿下。外公、我父亲,还有熟路的大姨伯,水都没顾上喝一口,转身就又冲进了夜色里,折返回去找人。一个结巴的乡下人,在这陌生的、巨兽般的城市里走丢了。没电话,没地址。只能沿着来路,从汉口往回,再上长江大桥,一路喊,一路寻。

夜渐深了,桥上的风大起来。走到龟山上的汉阳桥头附近,借着昏黄的路灯,他们终于看见了那个瘦小的身影——我的堂舅,正一个人扶着冰凉的铁栏杆,慢慢地朝前走,仿佛在丈量这座桥的长度。

“你……你做什么事了!”外公赶上去,话急,气也急。可那急里,不全是气。堂舅是他亲侄儿。对这个老实巴交的侄儿,我心里有份特别的疼惜与责任。

堂舅回过头,脸上没有走丢的惧色,倒映着远处岸上的灯火,有一种罕见的、平静的光。“看……看桥,”他结巴着,手指着脚下墨绿般流淌的江水和两岸星星点点的光,“好……好看。”

我的堂舅,后来也去世了。可我总觉得,那晚桥上浩荡的江风与无星的灯火,一定在他沉默的心里,点亮了什么东西,陪他走了很久。

第二天“过早”,范爹(外公的亲家)热情得很。饭桌上,摆着城里才有的白面大馍。我的父亲那双挖山的手,需要实在的力气。他沉默地拿起一个,吃完,又拿起一个……二两个的馍,他吃到第五个,手伸向第六个时,范爹脸上的笑有些挂不住了。“阿水,”范爹开口,声音里带着关心,叫的是我父亲的小名,“莫……莫吃胀坏了,慢慢来,有的是。”

我父亲的手,停在了半空。那张晒成紫铜色的脸,一下子涨得发暗。他放下手,没碰那第六个馍,嘴唇动了动,没出声。我懂得那沉默里的全部:一个凭力气吃饭的汉子,在亲人面前,被这突如其来的“礼数”拦住了本能。

这顿饭里的尴尬,后来成了多年温情的笑谈。如今,外公和范爹都已作古。只有我的父亲阿水,今年八十八了,有时说起,他会眯起眼,自己先摇摇头笑起来。所有的难堪,都叫时间酿成了别样的滋味。至于我,那个乡下小子,许多年后想起来,才觉出自己当时活脱脱是漫画里走出来的三毛:又矮又瘦,睁着一双饥饿又好奇的眼,拼命吞吃着一座城的陌生与热闹。从航空路走到中山公园,再到新华路、六渡桥。在孙中山先生铜像前,外公停下,让我站好。他已有些佝偻,却努力挺直腰,望着铜像,嘴里喃喃。然后对我说:“要记着。”我不知道要记着什么,但那个仰头的瞬间,铜像在八月的天空下格外肃穆,我小小的心,忽然很安静。

我的眼睛则像探照灯,扫扫人行道上下那些棕褐色的小点——给外公捡烟头。城里人多,烟头也多。我猫着腰,在无数移动的腿杆间搜寻,看见一个就飞快拾起。一天下来,竟捡了鼓鼓囊囊一大塑料袋烟头。拿回通山,夜里,我和外公坐在大堂前相连的竹椅和竹床上,就着昏黄的灯,把烟头一个一个剥开,将里面焦黄或金褐的烟丝,仔细抖在一张旧报纸上。外公那根竹烟杆,烟腔子用铜皮包着,他把这些混合的烟丝仔细装进烟锅里,压实。接着,他从怀里摸出一小截“纸模”——那是用旧账本纸卷得紧紧的实实的火引子,只看见红一点,隐着火。他凑到嘴边,腮帮子一鼓,轻轻一吹,那暗红的火头便“噗”地绽开一朵金黄的火苗,稳稳地燃着。他就着这火苗点燃烟嘴,吧嗒吧嗒地吸吮,烟雾缭绕里,他会眯着被熏着的眼睛说:“我外孙眼睛尖,手快。”我低着头,心里甜丝丝的。

也是在六渡桥,外公忽然撩起我又脏又小的汗衫。“莫动,”他粗糙的手指按在我脊背上,“这里有两颗痣。人驼痣,穷一世。”我自己从不知道。他做主,在街边找了个取痣的摊子。我就那样光着瘦精精、肋骨根根可数的上身,站在人来人往的街边。药水点上去,刺刺的,有点疼。如今半个世纪过去,我早已忘了痣的确切位置,也从不甘心它们是否又偷偷长回来——或许长了,或许没有,就像那句“穷一世”的老话,成了命运里一个淡淡的、无需去验证的印记。

回程的车上,大人们都累得沉沉睡去。只有我,把脸贴在冰凉的玻璃窗上,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、刚刚认识就要告别的武汉。它那么大,那么亮,把我心里那个叫“通山”的小地方,衬得又安静,又遥远。

如今,带我认识世界的外公,在桥上看见了“好看”的堂舅,唤我父亲“阿水”的范爹,都已成了往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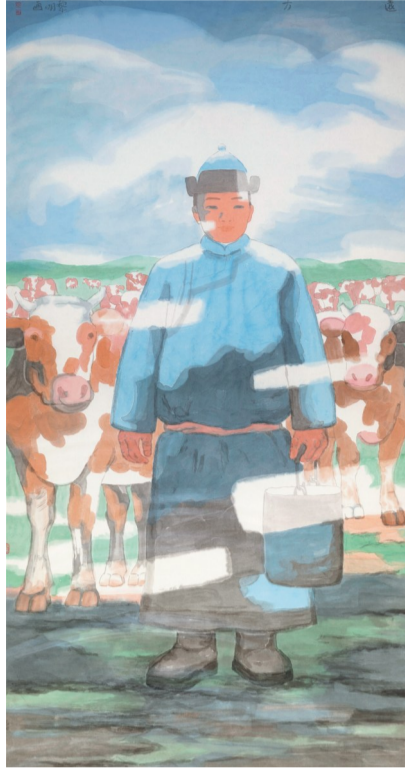
五十多年,江水依旧东流,大桥上昼夜川流不息。那个在武汉街头光膀点痣的瘦小子,如今也到了含饴弄孙的年纪。记忆像个筛子,留下的,都是这些发光的沙砾——有点个人,但实实在在,带着永不消散的体温。

我们每个人的那一点点故事,像长江里看不见的水滴,汇合,奔流,就成了再也回不去的昨日江河。但知道它曾那样真切地流淌过,就已足够。

记住该记住的。然后,像那列永不回头的绿皮火车,带着车厢里所有的事与烟尘——那烟尘里,仿佛还混着从外公铜皮烟膛里飘出的、我亲手捡来的烟丝味儿,朝着未来那片蒙蒙亮的晨光里,稳稳地驶去。

天边

安宁



远方(中国画)

田黎明 作

马丁靴,还执着地穿在他的身上。就连遮阳帽,也还是过去洗得发白的那一顶。硕大的背包里,倒是添了一架新的航拍机,这还是因为,上次那架不幸坠落在无人的山谷。

要不,等明天早晨我们再来看看,说不定风把玩了一夜,又把袜子给您吹回来了呢。我安慰他说。

哈哈,算啦算啦,走,我们散步去!额博先生豪迈地一挥手臂。

起床后,见天空阴沉,厚厚的云朵堆满了天空。太阳不知隐匿在何处,也许它忘记了黎明。秋风冷飕飕地在大地上游巡着,寻找一切可以让它裹挟的生机。一只鹰单划过长空,在云层中发出苍凉的鸣叫。大举南迁的鸿雁,排成浩浩荡荡的队列,在空中奋力扇动着翼翅。狐狸与旱獭正借着秋天最后的暖,四处忙着觅食。牛羊马匹则站在高高的山岗上,不紧不慢地低头啃食着被人类忘记收割的草叶。而在更远的天边草原上,发源于大兴安岭的乌拉盖河,正曲折向前,绵延三百公里,最终消失在神秘的乌珠穆沁盆地。

额博先生裸露的脚踝,在秋风里泛着青白的光,一条紫色的静脉血管,化作沉郁的河流蜿蜒而上,承载了他一生爱恨、奔腾不息的血液,此时缓慢下来,仿佛要将生命最后时光,更深沉地度过。

在我陪他将小花园再次地毯式搜

寻一番后,额博先生直起腰身,以百分百把握的语气判断道,不用找了,肯定是鸟雀给叼走了。

鸟雀叼走你的袜子做什么?我惊讶地问他。

秋天来了,鸟雀需要用它搭建巢穴,让它们的家园变得更温暖一些。

额博先生不容置疑的语气,让我相信,常年千里走单骑,与飞禽走兽相伴,为拍摄月夜下的蒙古马差点葬身狼群的他,对于自然万物的理解,远远超过书房里的博物学家。

能借您的一只袜子抵御整个寒冬,这真是一只幸福的鸟雀。我真诚地赞叹道。

嗯,那就把我的另外一只袜子,也留在这里,让那只鸟雀的温暖和幸福,再多一度吧。额博先生将剩下的那只袜子,郑重地悬挂在雪松向阳的枝干上,自言自语地说道。

我酷的岁月击倒了母亲,夺走了父亲,却让额博先生内心的善良,依然光芒闪烁,这汨汨流淌的炽热的生命,让我忽生敬意。

但秋天的风并不体恤额博先生对鸟雀的热爱,照例无情地一次次掀起他的裤脚,似乎要将乌拉盖草原上所有的寒冷,都灌入他的身体。

您冷不冷?我一路担着心,几次问额博先生。

想到我的袜子能给鸟雀一个冬天的暖,我心里正轰隆隆燃烧着一个小火炉呢。额博先生哈哈大笑道。

厚厚的云层紧贴着大地,似乎要坠落下来。阴天总是让人心情黯淡,尽管对于摄影师额博先生,阴天的色彩层次更为分明,但我依然希望在我们抵达之地之前,太阳能够刺破云层,照耀大地。哪怕只有一缕光线,也能给予秋天奔放的飞鸟与昆虫一丝动人的暖。

于是我问学识渊博的额博先生,您根据云层预测一下,我们今天能不能看到太阳?

额博先生凝神看了一会儿天空,厚厚的乌云后面仿佛有一束光,就在云层的热爱,细小微弱的光线照亮了灰白的天空,仿佛一双巨大的手掌,正奋力推开气势恢宏的天地之门。

正午十二点,太阳将冲破云层东边的罅隙,洒落大地。额博先生非常肯定地说。

注视着辽阔的天边,我的心里溢出一股暖流,仿佛冷风侵袭带来的冬天的暗示,并不让人悲愁。而在正午十二点抵达之前,我只需耐心地等待。就像一只为迎接风雪筑巢的鸟雀,耐心等待额博先生送来的袜子。

行走的方言

万强

24集电视剧《奇迹》在央视热播,15个独立单元,讲述了深圳特区成立45年来,五湖四海的移民涌向远方热土,在此工作、扎根的故事;秦腔京腔陇腔汉腔,东北人四川人河南人湖南人,还有说粤语的本地人,建设者们操着不同的方言汇聚于此,在创造出小渔村巨大都市奇迹的同时,也催生出一没有主体来源的城市语言——兼容语。

说起来,我第一次南下,去的就是深圳。那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,一个夏日的傍晚,我在某建筑工地旁的路边摊准备吃点东西,一会儿来了两位民工,其中一位年轻人用孝感方言对摊主说:“老样子,一碗命(面)条,一根油条。”见是湖北老乡,我便用武汉话与他套近乎:“老乡,你在这里打工,贵姓?”闻言此言,他脱口答道:“你贵姓(钱),就在旁边的工地搞水定(电)安装。”说罢又介绍旁边的中年人来:“这是我师傅,河南信阳人。”趁着餐后的工夫,我与信阳师傅闲聊起来:“您贵姓?”他答:“姓房。”我随口道:“哦,姓房的盖房,蛮好。”他听罢连连摇头道:“恁叫我雪(说),不是房屋的房,是姓房的房。”这绕口令般的解释搞得我云里雾里,幸好小钱替他解围:“他姓黄,是黄银(颜)色的黄。”

如果说空间阻隔和历史风俗导致了百里不同音,那么社会演变和语言碰撞则使方言产生渐变,现如今的信阳姑娘小伙虽乡音犹在,但肯定不会将“黄飞鸿”说成“房飞逢”;孝顺的年轻人也不会再将“有钱人”说成“有情人”。

那次深圳之行,我萌生了一个念头:行万里路,听万里方言,并将其作为人生目标。只是令我惭愧的是,在成长少年之前,我对方言可说是毫无概念,读小学老师教的是“汉普”,直至转学到鄂西北一家大厂的子弟中学念初一,跟着一帮来自四面八方的同学学家乡方言。一时间,武汉话的“搞么事”、郑州话的“中”和保定何爱说的“知不道”,成了校园模仿率最高的名句。在南腔北调东西语韵混响的山沟里,我完成了方言的初体验。

此后几十年里,但凡出差或出游,方言倾听都成了我的肌肉记忆。从三亚的天涯海角,到内蒙古额吉纳的策克口岸;从西端的国门红其拉甫,到东端的边境图们江畔,我被各个不同的方言牵引着,去听、去懂、去模仿,在行走中感受着方言特有的魅力。

记得巴金先生晚年生病期间,幸得上海作协一位朋友相助,我飞赴沪上探望。抵达虹桥机场排队候车时,工作人员得知我要入住巨鹿路的作协招待所,垫付一会儿后告知,坐车需走过多少个大转弯、多少个小转弯。上了出租车后,我问司机何为大转弯,司机用地道的海派腔调说:“大转弯嘛就是左转弯,小转弯就是右转弯。”

之后不久,出差酒泉到兰州中转时,曾去兰州大学附近转转,时近中午,我走进天水大街的一家牛肉馆。不一会儿,只见两名佩戴校徽的青年学子走进来,用西北口音分别报出了“二系”和“三系”。趁着吃面的当口,我凑近二人,好奇地问道:“请问兰州大学有多少个系?”“至少有一百多个系。”其中一人答道:“那你们二系和三系分别学什么?”二人先是面面相觑,继而恍然大悟道:“您不是西北人吧,二细和三细都是指拉面的直径。”我虽尴尬不已,但不得不承认,这种从舌尖上轻声弹出的方言,说者丝滑,听者悦耳。

如果说车牌号是一个城市流动的生活符号,那么方言就是一个地方无处不在的文化胎记。这些年来,当方言乘着艺术的翅膀,通过影视、音乐、小品、综艺的不断传播,“埋单”“套(就)是”“嘎哈”“忽悠”“唠嗑”“巴适”“棒棒”“僚(敞)的”“逗你玩”“搞哪样”“不服周”“额滴个神”“我的乖乖”“你的乖乖”的标志性语言登上大雅之堂,并为普通话推送了源源不断的流量词汇,同时也促进了方言的兼收并蓄。

记得那年冬天去东北组稿,刚抵达沈阳,一位媒体朋友几通电话帮我张罗与当地作者见面,说辞几乎如出一辙:“来且了,今晚见面的。”我不解“且”为何意,他解释说,因为闯关东的缘故,东北人都将关内来客视为亲戚,而“戚”在东北方言中几经演变,读成了“且”,也就是客的意思。他还顺便向我普及,非东北人大多除了东北人说着同一种方言,其实不然。除了发声不同,咬字也略有出入,用词更非一律,例如一个“贼”字,在东北所有方言片区中都有“很”的意思,但大连方言中对“很”的表达却有自己的最爱,那就是“血”字,如血漂亮,血好等等。

而在川滇交界的大凉山地区,人们将多民族通用的汉语方言称为团结话。一次到西昌采访,结识了凉山州的一位彝族文人,当我问及当地方言中量词何以任往小里搭配,例如一根路、一张车、一坨人等,他将此归结为三个原因:久居高山,信息闭塞,约定俗成,因为从高处远眺,山路自然不宽,车辆也不庞大,人堆被看成一坨,均情有可原。只是用“根”“张”“坨”来搭配,听上去倒觉得平添了几分俏皮。

行走于天南地北,浑然不觉时光如白驹过隙,忽然而已。那晚看罢《奇迹》,不由想起一位在青岛陪读的鄂州籍友人与儿子的对话:说鄂州话的是哪里人?鄂州人。说青岛话的是哪里人?青岛人。说普通话的是哪里人?普通人。此言虽有些许调侃的成分,但若隐晦:生为普通人,一头一尾都是联结着方言——始是人生起点,终为精神归宿。

喝黄河水长大的河津人

陆令寿

实在最要紧……”七年经营零投诉的口碑,全靠这份实在——难缠顾客不吵不辩,让利、重做或退款总能妥善解决,“和气生财,不让顾客吃亏”是他的章程。如今他四口之家和美,日子过得充盈踏实。

店里的菜实惠地道,无半点景区溢价。我点的西红柿鸡蛋面,粗瓷大碗里筋道的面条裹着浓稠汤汁,土鸡蛋的金黄、西红柿的嫣红、面疙瘩的乳白相映,酸香醇厚,吃得格外舒坦。同行者的肉丝炒木耳、鸡蛋炒粉,分量足味道正,满是家常熨帖感。坐于店内,抬眼便见黄河最狭河段,浪涛拍岸声隐约传来,景在眼里,味在舌尖,情在杯中,这份暖意,如浪涛般在心底久久回荡。

吃完面,我前往高谋庙探寻河津老故事。庙门朱红半开,等候的游客立于廊下,中着个儿、国字脸,皮肤是黄河滩日晒的深褐,眼角刻着细密纹路,一口浓醇河津口音满是热忱:“各位客官往里请!这庙有四千多年光景,一砖一瓦都藏着故事!”

踏入门楣,时光仿佛慢了下来。导游指向门楣:“这蓝底金书的‘高谋庙’三字是郭沫若先生墨宝,与对面乾隆年间的‘人初性善’牌匾隔世相望,别有韵味!”

正殿内,高谋神姜嫄华服凤冠,眉眼温婉。最引人注目的是献殿两侧壁画,导游轻声介绍:“这是河津藏了千年的活档案。”他条理分明地讲起西壁的“高谋之祭”和东壁的大禹治水图,说到兴起,他拂过面前的风,感叹道:“这风里的麦香,是后稷教民耕种的滋味。咱河津人世代喝黄河水、沐古寺风,文脉根脉从不断过!”

带着古寺的麦香与暖意返程,河津人的热乎气在出租车上延续。三日采风将尽,我与四位文友结伴赴运城盐湖机场。出租车司机光头亮顶,架着琥珀色眼镜,眼神爽朗谦和。听闻我们来参加

笔会,他挺直脊背称“老师”:“一路辛苦啦!累了不舒服随时说,咱随时停车歇脚!”说着便调低了空调风速:“天儿凉,吹风容易头疼。”

车行不久,同行女士内急寻厕,司机二话不说打转向灯靠边:“前面五百米有加油站,厕所干净卫生,保准不耽误事儿!”片刻后车稳稳停在门口,他特意指引:“女厕在这边,您慢慢去,我们等着!”女士归来连声道谢和夸赞:“这厕所干净卫生,不仅有热水、洗手液和抽纸,比好多大城市的都周到!”司机摆手笑答:“这都是该做的!咱这儿沿途有7个加油站、45个公厕,分布均匀,就是为了让大伙儿方便。”原来他跑这条线已十五年,沿途设施位置早已烂熟于心,堪称活地图。

闲谈间,他瞥向车窗外,带着歉意轻叹:“你们初来,是不是觉得空气能能见度不如南方?实在对不住,咱这儿是重工业基地,过去小煤矿多,现在仍有污染问题。不过国家和政府正大力治理,三五年后再来,保准还你们山清水秀!”话语间满是对故土的愧疚与期盼。

说到家乡的变化,他先是眼睛一亮,说起从前村里账房先生写春联的热闹:“逢年过节帮乡亲写春联、送对子,十里八村都飘着墨香!”可话音刚落,眼神又黯淡下来:“现在孩子们天天抱手机电脑,硬笔字都写得歪不端正,更别说道毛笔字了。老手艺怕是……”

他的话直白朴素,却藏着对家园的挚爱、对民生的关切与对文化传承的忧思。这份情怀不似黄河浪涛汹涌,反倒如河底暗流,叩击人心。这位平凡司机,用实在言行诠释了河津人骨子里的厚重与担当——对人的热忱、对土的眷恋、对家的牵挂,正是这片土地最动人的底色。

喝黄河水长大的河津人,把实在刻进浪涛,把热忱藏进龙门风里。来过,便记挂一辈子。